

用民间交流巩固新马友谊

第六届新加坡-马来西亚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成果，反映了两国关系健康平稳的现状。双方在会议上签署了“城市搜救计划”和“樟宜渡轮码头补充协议”两项谅解备忘录，进一步丰富了两国广泛和多元的合作关系。李显龙总理及纳吉首相也就新隆高铁这一重大工程，取得了更多共识。纳吉在为新加坡经济学会常年晚宴致辞时，更表示“两国关系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好”。

应当说，双边关系的基调，同两国最高领导人的私交息息相关。李总理和纳吉具有类似的背景，两人的父亲都当过政府首脑，所以从小就在政治氛围浓厚的环境里耳濡目染；彼此的年龄相仿，均见证且经历过新马历史上的风风雨雨，因而也深刻体会到维持良好邦交的重要性。两人的私谊在人与人之间的自然感情基础上，相信也是建立在要强化国家间关系的理性意识上。

无论从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或地理角度

看，新马在历史上本属一家，纳吉在经济学会晚宴致辞时，也用马来谚语形容两国唇齿相依的密切关系。尽管后来兄

弟分家，各自发展，然而各方面的联系依然藕断丝连。这种一荣俱荣的亲密度，注定了双方必须务实地处理好两国关系，因为对方的成败，最终必将对己方产生一定的影响。不仅双方政府明白这种特殊的命运共同体关系，两国民间对此也深有体会。

所以，促进民间原本就蓬勃的双边交流，对于巩固两国邦交无疑有举足轻重的影响。在探讨中的新隆高铁，正具备了深化民间交流的积极作用。终点站将分别落户于裕廊东，以及大吉隆坡地区新街场的新隆高铁，势必成为拉近两国人民关系的重要脐带。随着包括多条地铁线在内的重大建设项目的进行，高铁终点站所在的裕廊湖区，今后有望成为另一个商业中心；相信马国的新街场也将有相应的发展。这对完善双边的民间和商贸互通，肯定有加

社论

2015年5月7日

分效果。

基于同样的道理，关于增设多一处新马通道的可能性，也出现让人鼓舞的势头。就如李总理所指，衔接两地的现有通道，其使用程度已经达到极限，必须加以扩充。因此，多建一处通道，无论是“友谊桥”还是其他的连接方式，对双方都有利。虽然此前两国对于具体方案，存在不同的构想，也为此意见相左，但相信本着从人民的利益出发，基于互惠互利的原则，第三通道的实现，应当是指日可待的事情。

无论是高铁的建设，或者是第三通道的落成，无非都是为了扩大民间的交流机会，增进两地人民原本就深厚的感情。高铁将实现新马一日生活圈的愿景，用科技突破地理的制约，进而超越心理的距离感。第三通道也必然提高两地民众，尤其是新柔居民互动的便利。基础设施的作用，也必须有制度安排的辅助，才能产生效果。因此，扫清人为的障

碍，简化通关手续，降低出入境费用，是两国政府要重视的课题。

马国政府在去年调整出入境车辆的过路费，从单程收费改为双程收费。从新加坡入境新山的汽车收费不但提高超过一倍，对出境车辆也开始收费。新加坡政府出于对等原则，随后也宣布从原本的单程收费改为双程收费。这导致双向交通的成本上升，不只加重了日常出入两地的居民的负担，也造成商业成本增加，对民间交流和商贸活动都是不小的打击。要如何尽早改善这种不利局面，就看新加坡政府如何去协商。

远亲不如近邻，新马关系既属远亲也是近邻，理应更珍惜这个缘分。至今的经验表明，政治条件的改变，不时会让双边关系出现起伏，然而民间长期存在且不断茁壮的情感联系，却是避免两国关系脱轨的关键。所以，鼓励更多的民间交流来巩固新马友谊，必须是双方政府认真看待和努力的事情。

傅来兴专栏

越战结束四十年的反思

每一年的5月28日是美国国殇日，当天全美多地都会举行纪念活动，悼念在战争中阵亡的战士。今年结束四十年的越战将成为焦点，再度逼迫着美国人思考和反省这场战争。而越南上个星期四(4月30日)在胡志明市街头举行盛大阅兵式，纪念南越倒台的日子。

按照不同观点，西方称4月30日为西贡沦陷日，越南则称西贡解放日。其实从1955年1月起，在法国退出中南半岛后，美国就慢慢步入南越和北越之间的战争，到了1963年底，派遣到南越的军事顾问和支援部队达1万6300人，1964年再增至2万3310人，1965年约翰逊政府把越战升级为“局部战争”，扩大战争规模，开始对越南北方进行猛烈的轰炸和炮击，同时直接派军队入越参战。此时，越战已是美国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。

若从1955年算起，越战延续了四任美国总统——肯尼迪、约翰逊、尼克松和福特，最后越陷越深，陷入所谓的“越南泥潭”(Vietnam Quagmire)中。尼克松因国内反战浪潮高涨，才逐渐将美军撤出越南，象征美国的越南政策以失败告终。1973年1月27日，美国在结束越战的协定上签字，但战争却拖了两年，美国狼狈地撤出越南后才正式结束。

1975年4月7日，时任美国总统福特要求国会拨出紧急军费援助遭到否决，于4月23日宣布停止战斗。接下来的八天，美军仓促地撤走使馆人员、美国侨民及越南难民与孤儿，启动称为“颶风行动”(Operation Frequent Wind)的撤退计划。南越首都西贡(今胡志明市)陷入一片混乱，人心惶惶。一直到4月30日上午10点24分，北越部队发动总进攻拿下西贡，仅仅在位两天的南越总统杨文明宣布对北越无条件投降。正午时分，数辆北越坦克撞开总统府大门，持续整整二十年之久的越战正式宣告结束。

越战是西方媒体首次广泛深入报道的一场近代战争，其惊心动魄之处，是一个现代超级强国，首次被一个处在分裂的落后国家打败。这样一场不可思议的战争，引起我的探讨兴趣，阅读大量越战的资料和看了一张张的新闻照片，也看了多次越战的经典电影《猎鹿人》(The Deer Hunter)，那首主旋律《Cavatina》每听一回都是一次心灵的撞击。

有关越战的文字记录和图片，可说汗牛充栋，上世纪90年代初到胡志明市，经过总统府，遥想北越人民军的坦克车开进总统府的情形。在河内关押美军俘虏、别号叫“河内希尔顿”的监狱，仍静静地展在还剑湖不远处，一个新加坡女商人还曾计划将它发展成酒店。

越战结束后，越南政府在1975年9月4日，特别选在曾是美国情报局旧址上建造美军罪恶陈列馆，痛斥美帝

国主义在越战中的各种罪行。越南人告诉我，这个陈列馆是给外国人，特别是美国人看的。后来越南和美国建交，更名为越南战争纪念馆。纪念馆里面的照片绝大多数来自美国，外面摆放着各种美军在越战中使用的飞机、大炮、坦克等重型武器。有人告诉我，越南还有另一个战争纪念馆，是给越南人看的。

美国在二战以后介入多场战争，包括朝鲜战争、格林纳达战争、越南战争、巴拿马战争、海地战争、南联盟战争、阿富汗战争、伊拉克战争，越战是伤亡人数最多的战争，从1965年正式介入，十年征战，有5万8220个美军战死，至今还有15000个在失踪名单上。美国国会服务机构在2008年7月26日公布的报告透露，这场在万公里以外发生的战争，美国共耗资6860亿美元，比最初估计的2500亿美元多出将近两倍。

越战在美国内部造成莫大分歧，如果不是国内出现反战示威，越战可能会再拖下去。美国媒体对于双方战争伤痛和生命损失的报道和发出的照片，极大地影响了美国民众，也影响了美国政府撤离越南的后期决策。

越战期间来自各国的记者和摄影员，用文字和镜头记录了越战期间和结束前几天的情况，成为那段历史的珍贵材料。南北越要到1976年才完成统一，每次的纪念仪式，只是凸显战争夺走无辜越南人生命的悲剧，至今仍有数千个越南家庭生活在悲痛之中，一些家庭家人几乎都死在战争中，有些则因落叶剂而生下畸形的下一代。

回看这些珍贵照片，记载了越南近代国家历史上非常沉重的一页，静静诉说着一幕幕惨不忍睹的历史。越战对美国人来说永远是一个痛苦的话题，包含着无尽的悲痛和深刻的历史教训。那场西贡大撤退时大混乱的景象，对于美国人来说是一个无法磨灭的历史刻痕，年年都被提起。

越战是冷战时代的其中一个悲剧后果，对越战的纪念和反思，不是美国如何输掉了这场战争，今天人们更多从人道与和解的层面来评价那场战争。对广大越南民众而言，越战对他们何尝不是永远挥之不去的噩梦，南北越南民在整场越战中死亡至少300万，失踪人数高达30万。

越战对新加坡人的记忆，或许是北部霍金斯路(Hawkins Road)曾收留过5000多个越南船民的难民营，以及曾让我们担心过的骨牌论。硝烟已散，2011年4月24日，越南现代史上饱受争议的“孀夫人”陈丽春在罗马去世。同年7月23日，越战期间的风云人物、南越前总理阮高祺在吉隆坡去世。2013年10月4日越南著名将领阮元甲去世。但越南人对越战的记忆并未因时间的流逝而淡忘，尤其是在4月30日这个特殊的日子。

作者是本报高级评论员

观点碰撞

禁止酷刑比废除死刑更重要

为数不少的、我所欣赏的中国法律人呼吁废除死刑，例如贺卫方教授和滕彪博士。我反对废除死刑。死刑存在的最主要的依据是罪刑相当。在自然界，平衡是一种美；在人类社会，讲究权利和义务的对立和统一。对待杀人者，没有比死刑更对等的处罚。有“罪行相当”这一原则足够了，有什么无威慑力，我不关心。

死刑不是最严厉、最残酷的刑罚。有句话叫“生不如死”。例如，吕雉把她的情敌戚夫人做成“人猪”，武则天把她的情敌王皇后和萧妃做成“酒猪”。有人说，只要不处死，总有洗清冤屈的机会。假如戚夫人她们不死，你觉得还有做正常人的机会吗？

有人说，“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”是一种野蛮、落后的思想。大错特错。我支持死刑，绝非支持“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”。假如一个人打断了别人的腿，我不支持也打断他的腿。我支持死刑，但反对酷刑，例如凌迟之类。打个比方，我支持杀猪、吃肉，但我也主张温柔地杀猪，让它们少些痛苦地死去。让犯人有尊严地死，是人类社会的进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死刑不是酷刑。查阅此课题的学术论文，非常高兴地看到美国最高法院也持这种观点。

贺卫方教授提出一种观点：“废除死刑避免冤案”，这是典型的因噎废食，因为怕噎死，所以不吃饭了。美国最高法院的看法非常好：死刑的适用可能违宪，但死刑本身不违宪。避免冤案，主要是克服司法不公，重程序 and 证据，排除合理怀疑，做到疑罪从无。避免冤案和废除死刑没有直接关系。

贺教授提出以“不得赦免的终身监禁”代替死刑。外国批判中国的劳改制度剥削和虐待犯人。如果中国以

后的监狱像西方的那样，好吃好喝好招待，会有一批人想方设法进监狱，监狱负责养老，多好的事。敢问贺教授：纳税人将来有一天可能老无所依，凭什么花钱养着一群罪大恶极的寄生虫？

贺卫方说：“以直报怨，而非以怨报怨。”我不喜欢孔子，但是我欣赏他的这句话：“以德报怨，何以报德？”纵容坏人，就是伤害好人。对坏人仁慈，就是对好人残酷。我想起了农夫和蛇的故事。我历来主张和解，那是在真相和适当惩罚下的和解，绝非无原则的和解。

有人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，宣称国家没有宣判和执行死刑的权力。这种权力来源于法律。按照上述理论，法律就从根本上崩溃了。处死权并非来源于犯罪人对自身生命权的让渡，而是受害人及其家属对私力救济权的让渡。这种让渡以公民意志的形式上升为法律。

我认为死刑是否存废，要看民意。美国的做法值得参考。该国最高法院在福尔曼案中，首先提出了“一项严厉的刑罚应当得到当代社会的认可”。随后在格雷格案中认为死刑符合美国“当代价值”。美国最高法院认为民意并非简单地来自民意调查，而是来自立法机关和陪审团。

我支持死刑，但同时主张严格限制死刑。根据罪刑相当原则，死刑仅适用于严重的暴力性犯罪。我再次强调疑罪从无，最大可能地避免冤案。冤案是无法绝对避免的，但这不是废除死刑的理由。我认为减少痛苦和有尊严的死是一项基本人权，我永远、坚定地反对一切形式的酷刑。禁止酷刑比废除死刑更重要。

作者是中国山东大学学者

文化视角

从“海外注我”到“我注海外”

谈到主体、外在、意义、经典和认知，一些中国人都听过“六经注我”和“我注六经”，两种由陆九渊所提出的著名宋代理学阐释学路径：“六经注我”强调认知和意义是个人行为，一种基于个人独创的主体性阐释学，六经都可用来阐述个人理解；“我注六经”则代表一种文本和意义还原的阐释学路径，个体的认知和意义探索，皆在不断从外部和陌生，逐渐走进内部和熟悉。

我想把这种分析路径运用到中国理解世界和研究外部世界的问题上，并把“经”扩大化一点，用来指称包括经典和文本在内的多种“知识的外部性”，尤其用来说明中国人对海外的认知和体验。这样一来，认识海外与海外互动就像研究“六经”一样，也是从无知、少知到熟知、真知，同时周期性循环和反复的认知进阶。

从这个角度，我想模仿上述的方法，将中国理解世界分为两种境界，一种是“海外注我”，另一种是“我注海外”。

坦白来说，作为一种整体性认知，时下中国由各种学科构成的海外知识和中国的海外性(国际性)表述，都有点“海外注我”的特征，在认知上基本继承了中国人对认知外部世界的整体性框架。例如在国际关系和历史学领域，许多研究国际秩序、权力、国际政治的学者，都仍然偏好从天下、霸业、霸权、国祚、王道、世系、认同、归附等视角，去重新再阐释他们眼里的现代国家关系和全球秩序，用春秋、战国、秦汉、三国等历史认知遗产，来解释现代国家的现状和未来，一直是严肃学术和通俗新闻叙述都喜欢的程式。

这种习惯和认知惯性可以带来很多便捷的认知效果，因为中国连续书写的史乘，丰富的历史记忆和记忆，庞杂而多元的物质体系和现实语境，中国人在和外国人讨论学术问题和国际沟通时，经常会说：你这个东西中国也有，我们把这个叫什么什么，你这个根本就是和我们相通的。

甚至在现实的政治互动和社会生活里，中国也时常依照他们自己的历史记忆和想像，创造各种类似“炎黄故里”“水游城”“清明上河图”之类的历史肉身还魂；更常见的是中国人通过他们的国际想像，创造各种他们凭借想像建构起来的国际性。例如在盖楼时常模仿的左岸风格、英伦风、哥特城堡、国会大厦、东方威尼斯、东方日内瓦、中国时代广场等等。

从整体效果来看，六经注我式的海外研究也很有意义，它可以产生对于中国人来说有具体意义的中国观、中国模式、中国方法。但是这种“中国”作为一种方法的研究程式，没有系统对海外的基础研究，尤其是摆脱西方认知框架的研究，是很难名副其实的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我认为中国学人首先应该从“我注六经”，学习一种“我注海外”的认知模式。这种方法的起点不是西方文献，中介语不仅是英语和法语等西方语言，而应该是培育通晓多种对

象国的本土语言和方言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学者，同时通过对本地语言的熟练，直接提炼一种本土的认知观，再在此基础上和所谓的西方对话。

例如在研究缅甸时，常规的做法是通过选择几本有影响力的缅甸文献和西方文献入手，再通过整合缅甸几个重要城市的研究资料，特别是通过媒体呈现的资料，然后生产一批类似于《缅甸问题白皮书》式的文本。中国人习惯于根据政治热门词汇来把研究对象问题化，想因此形成对中国对外交往的策略应对。这些大量生产的策略应对文章，经常扁平思考、过度推论、简单化阐释、牵强附会，形成极坏的文风和研究习惯。

相反，真正睁眼看世界、或看缅甸的研究，应该是一种多重视角的研究汇聚：首先是对中国人认知缅甸的问题提出疑问，也就是“问题的问题”；其次，通过不同语言、方言、生活经验、政治和社会事件所提供的问题表述；再者，从更广阔的地理半径、社会互动、文化融合的视角，去生成一个现实的缅甸——换句话说，如果把缅甸研究整体看成一条河流，不仅要研究缅甸之河的既有流向和航道，还要研究那些汇聚成缅甸之河的各种溪流。

中国目前的海外研究主要问题在于：在中国学者研究海外尚未真正建立有效的文献体系、跨界方法和现实应用策略的同时，中国已经在加速走向世界，或者说世界走向中国。中国的许多国际战略互动框架和假设，需要更为透彻的看世界的方式，这样才能在理解世界的应然和实然之后顺势而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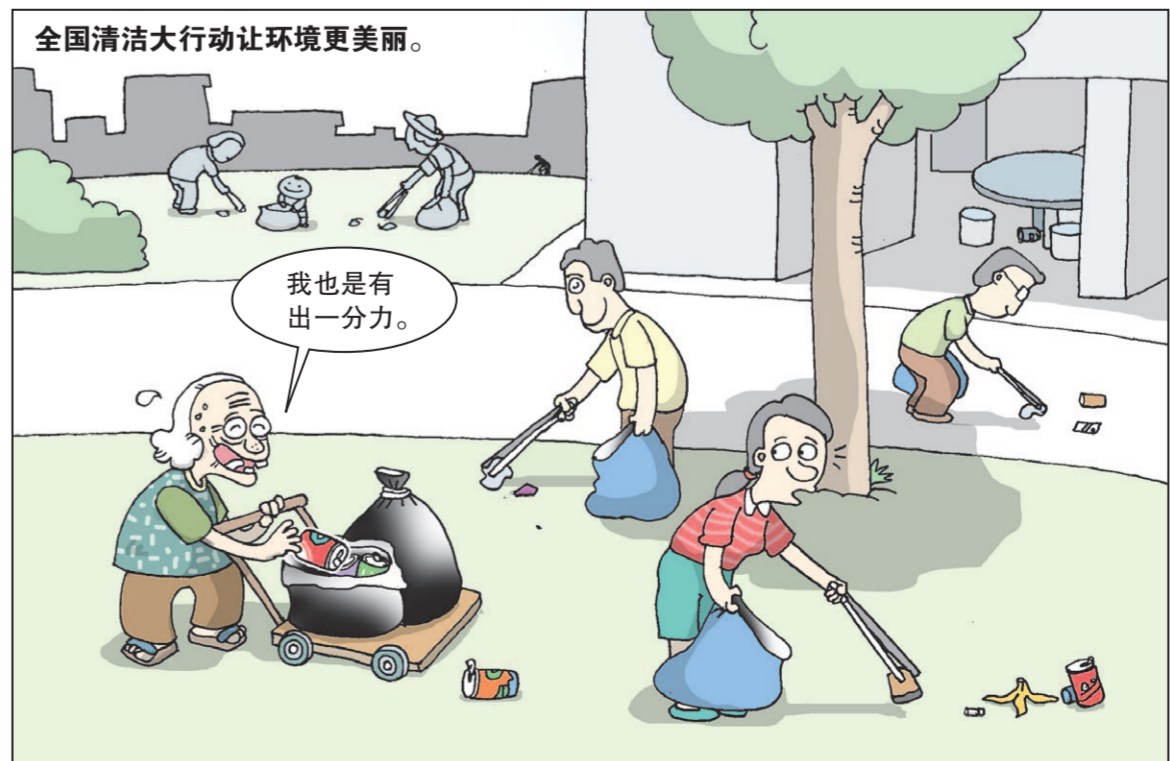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人的海外研究如果要转向“我注海外”式，除了前文所说的语言转换、问题意识重估、认知架构调整之外，还要寻找到新的对象和研究主体。例如在海外的许多文化互动中，真正的主体是类似中电投、中石油、中石化、中海油这类国企，他们是对象国理解中国的中介。

中国的海外研究要从传统“西方式”框架中跳脱出来，不仅研究国家、认同、战略协同、政治地理、军事地理、经济一体化、马六甲海峡之议题、信息社会、政治极权，还要对一些新兴出现的群体，进行更为有效的研究，尤其是这些通过巨量投资走出去的中国人、中国符号和中国资本。作为在前沿进行互动的中资企业，也应该有将海外研究、海外互动效果评估和纠错，融合资本投资的基本机制；现实情况下，中国资本在海外低下的文化学习能力及社会合规能力，在进行大体量经济互动的同时，也对中国的对外形象造成诸多灾难性的影响。

中国的著名新诗派诗人黄遵宪曾经说过一个著名的改变文风的话：“我手写我口”。但是在中国与海外对话的时候，我手写我口却有时不能产生作用，而是应该他手、他话、写我口。

在心未动、口不能言、思考不逮的知识格局之下，中国的海外互动之身已走远，我想这大概概括了中国研究海外的整体尴尬。

作者是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



早报漫画 蔡新友